

Antoine Liang Tsong Tai

Dont j'aime

l'esprit de savoir et de l'histoire

Paul Valéry



名士风流

Scholars and Scholarship

中国当代“翰林”纪事

柳鸣九/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名士风流

Scholars and Scholarship

中国当代“翰林”纪事

柳鸣九/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名士风流/柳鸣九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1. 4

ISBN 978-7-80251-883-4

I. ①名… II. ①柳…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1) 第041153号

Copyright©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 **金城出版社** 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名士风流

作 者 柳鸣九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635毫米×965毫米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1年4月第1版 2011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刷 北京蓝迪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80251-883-4
定 价 38.00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11区37号楼 邮编: 100013
发行部 (010) 84254364
编辑部 (010) 84250838
总编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前言

这本书是《“翰林院”内外》与《这株大树有浓荫——“翰林院”内外二集》的合集。

“翰林院”何所指，我曾经作出如下的说明：原来属于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社会科学部与后来由它独立而成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都是我国天字第一号的意识形态机构，一直由中央直接领导，故借一古老的名号，简称为“翰林院”。

这里一直是我几十年以来安身立命的所在，是我观察着、感受着、见证着的所在，也是我自己发展着、变化着的所在。将近古稀之年，我陆续把对过去周围长一辈的老师与同一辈的友人的认识、理解、感悟与怀念陆陆续续地记述了下来，成为上述两个文集的主体部分。当然，“延伸”多少也有一点，不外是扩充到了我的母校北京大学的几位师长与同学。

如大家所看到的，我所记叙的这些对象基本上都是人文领域中的名士大儒，我深知，记述他们为文，不仅是个人感情的怀念，也不仅是机械的简单记录，更不是讲套话式的应景，而应该是“一桩精神文化的使命”。正如我在《二集》的自序中所说的那样，我作为他们的后辈或同辈，借助自己有就近直接观察与见证的条件，对这些人文学识分子代表人物在特定时代社会条件下的存在状况、文化作为、精神心态、言行方式，应该有真切的观感、认真的思考。这需要有人文之智慧与表述之才情，虽然我智商水平、“才商”水平均甚有限，但尚有诚意朝言之有物的方向努力。如果我这些论述为中国一两代人文知识分子的部分代表人物、特别是西学名士，留下了若干真实的身影，多少反映了一点时代社会的面貌，我就感到很知足了。

此次的二书合并，内容上稍稍略有增补，标题我则仍力主沿用《“翰林院”内外》的书名，但投资方（出版社）出于文化市场机制的多重实际考虑，坚持要改，并建议了“名士风流”这一标题。在目前文化领域市场机制至上的情势中，我无法坚持己见，我想，如果名士的“风流”不仅意味着他们才能的焕发与情智的闪亮，而且也蕴含着他们面对坎坷、困顿与尴尬时的状态与方式这一层含义，那么，《名士风流》这样一个书名也还是可取的。

柳鸣九

2010年10月

Contents 目录

- 001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 004 梁宗岱的药酒
- 008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回忆与思考朱光潜
- 025 仁者李健吾在“翰林院”
- 050 记忆中的冯至先生
- 062 蓝调卞之琳
- 088 这株大树有浓荫
——回忆与思考何其芳
- 120 辞别伯乐而未归
——纪念与思考蔡仪
- 149 君子之泽、润物无声
——心目中的“钱、杨”
- 194 永远的老师
——怀念郭麟阁教授
- 199 有师恩在也
——纪念吴达元教授
- 203 译界先贤陈占元

- 212 杨周翰的矜持
——纪念杨周翰先生
- 218 闻老夫子的“谁道人生无再少”
——回忆闻家骊
- 227 在“六长老”半世纪译著业绩回顾座谈会上的致词
- 231 徐继曾与柏格森
- 235 我所知道的严怪愚
——一位难忘的中学老师
- 242 西出阳关一故人
——记樊修章
- 247 一位英年早逝的绅士学者
——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吕同六
- 255 书生五十年祭
- 261 围绕“博士”的若干回忆
——闻成为博士论文专题对象后感
- 276 我劳作故我在
——自我存在生态评估

“兄弟我……”

——北大校庆纪念日怀念马寅初校长

随着今年“五四”的临近，各界庆祝“北大一百周年”的气氛愈来愈浓，关于北大往事的书出了不止一本，有的刊物上开辟了“北大人专访”的栏目，老同学、老朋友之间通电话，少不了要互告母校将举行盛大规模的纪念会，凡北大毕业的，都收到了邀请函，等等。

我虽然未忘母校教养之恩，但并没有多大的“恋母情结”，在这一片热闹的气氛中，我仍然按照已有的惯性，忙于自己“该干的活儿”，一时还没有酝酿出缅怀情绪，险些把邀请信的事也给忘掉了。

前几天，从外地参加了一个会议回到北京，夜晚打开电视，偶然碰上一个比较“冷清”的频道正在放一个电视连续剧，初入我耳的一句台词：“马老，马老……”，一下就把我吸引住了，使我没有立即把它换掉，电视剧演的是北大老校长马寅初先生的事。于是，我一口气看完了这晚的两集，然后，第二天又看完了最后两集。而前四集放映时，我因为在外地，没有看上。

说实话，我平时对传记电视连续剧没有兴趣，这一部电视剧又拍得有些简陋，但我，却破例地把它看了下来，原因很简单，仅仅因为它讲的是马老，我所看到的四集，正是讲他的“新人口论”遭到批判后他的晚年生活。这部电视剧不仅吸引住了我，还使我颇有些激动，产生了对马老、对母校深深的怀念之情，以至不得不放下手头的工作，想写几行文字。

其实，我与马老连一面之缘也没有，在北大当学生时，只是有那么几次远远地看见他在主席台上。记得在开学典礼上，我们学生们最大的愿望就是想看清楚这位中外闻名的经济学家、北大的第一号学术权威。要知道，

青年学子的第一崇拜，从来都是学术权威崇拜。翘首遥望，但见他秃头发亮，矮矮墩墩的，非常结实，如果今天要作个比喻的话，可以说有点儿像枚炮弹，和我想象中儒雅而又洋派的学者形象大不一样。他一上来声如洪钟：

“今天，兄弟我向诸位表示欢迎……”那天他讲的很短，但讲了些什么，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别的校领导的长篇报告讲了什么更记不清了，但马老那特别的自称：“兄弟我”，却从此深深印在我的脑海里。当时乍听，我就一愣，我辈刚在中学里饱受熏陶，满脑子里都是“毛选语言”、“解放腔”，难免觉得这个自称是典型的“旧时代语言”，与开学典礼上浓浓的政治气氛颇不一致，甚至有那么一点“江湖气”。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脑袋的开窍，我倒愈来愈体味出“兄弟我”这个别具一格的自称，特别令人有清新之感。它不在乎语言时尚，不在乎环境场合，不在乎礼仪规范，它平易近人，给人以亲切感、亲和感，虽然只是这么一个自称，倒充分表现出了马老那种我行我素、不流俗附和的风度。

在北大期间，我们学生没有多少机会见到马老，校园里碰不到他，只知道他住在燕南园校领导住宅区，全校性的大会也很少见校长出来讲话，每次大会，党委书记长篇的报告时间还不够用呢！只有一两次有他出席讲话，他没讲半句政治大道理，也不谈学术问题，而是大谈他如何坚持爬山，风雨无阻，如何坚持冷水淋浴，冬天也不间断，语言仍然是典型马式的：“今天，兄弟我向诸位介绍点健身经验……”另有一次，是陈毅元帅来向全校师生作外交报告，大会是由马老主持的，他只讲了两三句开场白，特别简单痛快。

回想起来，那时的马老之于我们学生，就像是云端里的神，如果来到你面前，一定是很慈祥、很随和的，但他没有多少机会走下云端来，学校里大大小小的事，都是党委书记、教务长出面。用今天比较通俗的话来说，他是“不管事的”，只是“名誉性的”。虽然我们很少听到他的讲话，他每次讲话又都很短，但在每次讲话中“兄弟我”、“诸位”两词出现的频率还是蛮高的，我愈到后来，愈觉得它们出自马老之口，有一种独特的风格力量，形成了一种启迪，如果我这一辈子也曾有过一次两次“我行我素”的话，我得感谢“兄弟我”，对我最早的潜移默化。

1957年从北大毕业之后，我忙于对付自己的“职业要求”，很少注意马

老的消息，后来听说他的《新人口论》遭到了严厉批判，又听说他被免去了北大校长的职务，还搬出了北大，住在东总布胡同一个有扇红色单开门的宅院里。这个具体过程，当然是我辈不可能了解的。东总布胡同就在我工作单位的附近，每当我从那扇红门前走过时，总不免产生一缕思念：那矮墩结实的老人正在家里干什么？

前几天，从电视剧里我总算了解到，《新人口论》遭到泰山压顶式的批判后，他仍坚持自己的立论，拒不认错，即使有多年老友、政界名流、党国要人纷纷以“大局为重”、“权宜之计”等等的理由，劝他交一纸检讨了事……

在狂热迷乱的年代里，从北大燕南园里产生的《新人口论》提出了中国人口过剩危机的问题，大声疾呼要控制人口的增长，这是20世纪下半叶中国思想史、经济史上的一道巨大的灵光，是北大近半个世纪历史上的光荣与骄傲。它关系到全中国的国民生计，如果当时虚心听取它的声音，今天中国人的日子要好过一些，中华民族的包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深重，它作为科学真理，像神谕一样不可抗拒，对它的轻侮与践踏已经招致了严厉的惩罚。它象征着北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力量所在，作用所在，对它的“批判”，是横加给北大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屈辱。

我感到可惜的是，《马寅初》这样一部电视剧，被放在《午夜剧场》里，几乎是无声无息就被放完了。也许安排节目的官员是以这部电视剧制作得比较简陋为由的，但是，在电视传记片成堆的今天，为什么这部电视剧偏偏是“少投入”、“小制作”呢，它讲的是一个关系到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呀！可是它仅仅是浙江一个县张罗出来的，最后由一家省电视台出面播放。

在北大校庆之际，这是我感到的一个遗憾。

这篇感言收笔之时，从报上看到一则某出版社“推出北大校庆图书”的消息，消息列举一大堆书目，其中唯独没有一本有关马老的书。我不禁感到又一个遗憾！

1998年6月

梁宗岱的药酒

今年是梁宗岱先生诞辰一百周年。

他是我的老前辈，比我长三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广州当教授，而我上完北大后一直在北京工作，按说，我是无缘与他相见相识的，但由于一次特定的机遇，我却有幸与他有过一点交往。

1978年11月，全国外国文学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那不仅是“四人帮”垮台后全国第一次这种性质这种主题的会议，而且，新中国成立后就从无先例。那次会上，有意识形态部门高层领导的大力支持，又有像“翰林院”这样的国家重点单位出面张罗，官费富足、经济基础坚实，会议的议题又是如此重大而激动人心：总结新中国成立后三十年的外国文学工作，讨论今后的发展大计，并成立全国外国文学学会。硬件软件一一具备，岂能不开成一个空前的盛会？

作为盛会，它聚集了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文化界中从事外国文化工作的名家、“大儒”：冯至、朱光潜、季羨林、杨宪益、叶君健、卞之琳、李健吾、罗大冈、伍蠡甫、赵萝蕤、金克木、戈宝权、杨周翰、李赋宁、草婴、辛未艾、赵瑞蕻、蒋路、楼适夷、绿原、王佐良，等等。还有一些文化出版界的权威人士，如吴岩、孙绳武，与人文学科研究有关的大学校长，如吴甫恒，以及一大批来自各研究机构、各大学院校、各文化单位的骨干精英与负责人。名流云集，济济一堂，高朋满座，竟有二百多人，就其名家聚集的密度而言，大概仅次于中国作家代表大会。而意识形态领域里的周扬、梅益、姜椿芳等人的参加，又增加了会议的官方色彩。

在这一片繁星闪烁之中，梁宗岱先生是其中格外引人注目的一个，尽管他从新中国成立后在学术文化上就没有什么“大动作”、“大声响”，甚至可以说是相当沉寂，但大家都知道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已经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绩，他精湛的译诗技艺、他才华横溢的文学评论，他雅美而灵致的诗章早已享誉中国文化界。

那时，我四十多岁，在学术权威如云、延安鲁艺老革命战士成班成排的本单位，我们这种年纪的都被称为“年轻人”，意指“在思想上、业务上尚不成熟”也。我是作为“壮劳力”来参加广州会的，一是要承当在全体大会上作一个重点发言的任务（这就是后来令一些“庙堂人士”侧目而视、怒目而视的那篇批评日丹诺夫论断的报告），二是在小组中充当会议记录，会后再加以整理。因此，能自己支配的“业余”时间甚为有限，不可能较多地趋近与会的名流以讨教，但我把我“业余时间”的大部分都用来“走近梁宗岱”，毕竟在我本人这个学科专业中，他是资格最老、技艺最精湛的一位大师，是我敬仰已久的一位前辈。

梁宗岱很好接近。他不摆文化名家的派头，不端着学者名人的架子，更不像那种以“学界霸主”自命的人满脸威严逼人，不像那种自认才学盖世的人全身傲气，叫人感到骨子里发冷。他长得人高马大，嗓门儿粗，像个豪爽的东北佬，大大咧咧的，平易近人。按说，他跟我这样一个学界晚辈素不相识、差距甚大，广州会议期间两人又不同在一个小组，更无人向他引见我，是我自己主动“凑上去”的，他满可以只敷衍几句，但他却非常亲切、平和，非常热情，主动营造出一种“一见如故”甚至是“自来熟”的氛围，使你感到很是自在。他谈兴很高，说起话来似乎毫无遮拦，饮食、起居、健康之道、生活常识……无所不谈，特别是关于他的制药技艺与他的“药酒”更是谈个没完没了，有时会议间隙在过道碰见时，他还主动跟你说道说道。

他自称，他正在全身心致力于中医中药研究，致力于研制能治百病的药剂与药酒，并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中医药本来就是一个大领域、一门大学问，谈起来还有个完吗？何况他是个心智丰富的人，在实践中又有那么多的心得与体会，进展与经验，他的话匣子一打开，你就洗耳恭听吧，他讲起来那么热情、那么专注、那么天真，天真得像一个迷恋某种游戏的“老

顽童”。别说需要你插话接茬，增加他的谈兴，即使你想把他的话匣子关掉，你也很难做到。

他如此善谈，可是，他偏偏不谈文化与学术，不谈会上讨论的那些外国文学问题：经验与现状，前景与道路等等，总之，言不及义，言不及这个学界、这个行当的“义”。

说实话，像我这样的后学，之所以怀着景仰之情接近他，是想从他那里闻一点本专业治学之道，在评研与译介的真谛上获若干启迪，拾些牙慧，还想得知一些学界、文坛过去的珍贵逸事。然而他却绝口不谈这些。当你问及请教时，他也予以回避，似乎已经横下了这样一个决心：“好汉不提当年勇”。因此，在广州会议期间，我虽然走近了梁宗岱，直面了梁宗岱，真可谓近在咫尺，但实际上他却隔我很远很远。他大讲特讲的药剂与药酒，我不大懂，实在也不感兴趣，只是出于礼貌，装出一副倾听受益的样子，而我想谈、想知道的，他又绝对没有兴趣去谈。于是，在学子后进的面前，那个在文化学术领域里实实在在的梁宗岱不见了，面前只有一个乐呵呵、和蔼可亲的制药老汉，一个陌生的梁老头，从他身上，你看不见当年他游学欧洲的潇洒身影，看不见他与罗曼·罗兰、瓦莱里等法兰西文化大师“称兄道弟”、平等交往的痕迹，察觉不到他译象征主义名篇《水仙辞》的那种出神入化的功力，以及他把文学评论文章写得那样潇洒而富于文采的本领……

不过，他也偶尔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时候，那就是在会议期间，他把自己的情诗出示给走近他的年轻人传阅。我记得是一些旧体诗，有一部分是填的词，誊写在红格稿纸上，纸已经相当旧了，显然是压在抽屉已经好久。我当时正忙于俗务，诗稿又只能在我手上传阅几个小时，因此，只来得及粗读了一读，如今只记得内容缠绵婉约，颇有李商隐之风，而如梦似幻的意境则又使人感到有象征主义的韵味。

那次盛会，全体大会上的学术发言，只安排了三个，将近一周的会议都是以小组讨论的形式进行。我和梁先生不是同一个小组，一直未听到他的发言，但听其他组的说，梁先生在小组会上也几乎不发言，绝不对文学问题、文化问题发表意见。这一切使我当时就形成了很明确的印象：在这次会议上，梁先生大有超脱出世、看破红尘的味道。如果当时我还有些不理解的话，后

来我就理解了，梁先生在“文化大革命”中不止一次遭到毒打，他辛辛苦苦译出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与《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竟被毁于一旦。一个身心遭受此沉重打击的七旬老人，伤痛哪能迅速痊愈？哪能在“四人帮”垮台后不久的那次盛会上就满腔热情地讨论外国文学工作的发展大计？及至我自己的经验有长，吃了一堑之后，就更感到梁先生真可谓是“老马识途”了。因为我自己不知深浅，在全体大会上作了一个长篇发言，大批日丹诺夫论断，对西方20世纪文学进行重新评价。事隔不久，麻烦就来了——在第二次全国外国文学工作的会议上，我就被扣上了这样一顶小帽子：“批判日丹诺夫就是要搞臭马列主义”。

在药酒问题上，虽然我在天真的梁老头面前应声附和与表示钦佩的话都是言不由衷的，但他却以一片赤诚待我，他见我有些“少白头”，就主动询问我的睡眠情况，着重介绍了他的药酒对神经衰弱有奇效，还曾邀我去他家中去看他的“制药作坊”，但我没有想办法抽出时间去看。会议结束告别时，他又送了我一大瓶“药酒”，叮嘱我服完后还可以写信去要。那其实是一瓶咖啡色的汤药，但放了酒，据他说是为了保鲜防腐。我尝的时候，觉得其味甘苦，口感很好。

据说，梁宗岱的药剂药酒研究始于20世纪40年代中期，这似乎是他偶尔为之的“采菊东篱下”，他专心致力于斯，显然是他“文化大革命”后的晚年。他在广州会议五年后就去世了，因此，我见到的可说是“药酒时期”的梁宗岱。

最近，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多卷本《梁宗岱文集》，收入的作品都是常绿常青的，具有持久的文化价值与艺术生命。虽然梁宗岱在晚年绝口不谈自己的文学作为，但世人还是要谈论他的，长久地、长久地谈论他的业绩，后人无法取代的业绩。

2003年9月5日于怀柔一庄

两点之间的伽利略

——回忆与思考朱光潜

—

最近，在《文汇报》的“笔会”中，看到一篇回忆朱光潜的短文，是著名的摄影家邓伟写的，并附有他所拍摄的一张朱老先生的照片。由于父辈的关系，他曾有幸成为朱光潜的一个较为亲近的小字辈，因此，保存了若干对老先生的亲切回忆。这篇文章与这张照片，也激活了我自己对朱光潜先生的思念。

在上年纪的人身上，怀旧倾向是一种天然的温床。外来的因子哪怕只像蒲公英飞絮那样轻忽，也可以萌生出一片繁茂葱郁的回忆之绿茵，就像普鲁斯特舌尖尝到的那块玛德莱娜小甜点，竟引发出如流水潺潺不绝、似江河浩淼流淌的陈年往事那样。一般说来，怀旧的心理惯性是以两个条件为基础的，一是往日积累下了丰富而生动的印象与感性知识，一旦记忆的闸门打开，往日的印象、感觉、对形象与氛围以至颜色、气息……的记忆即纷至沓来，如势不可挡的潮水，就像普鲁斯特那样，忆出了整整一个“似水年华”，并写成了一部长篇小说；另一个条件，则是往日在某件事上、在某个方面感触甚深、震动甚大，一旦再次引发，便感触陡生、思绪纷呈，鲁迅夜遇一个人力车夫的“一件小事”，后来却引发出一大篇的感言，大概就是这种情形的例子。

说实话，我与朱光潜先生并不熟稔，也不接近，具体的交往并不很多，因为，我和他不是在同一单位任职，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师徒关系，就像他与张隆基那样。几年前，学术文化界曾有人把我称为“朱光潜

的学生”，基本上是一种牵强附会。原因不外有三：一、我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而朱先生就是西语系的名教授，但我在北大时，的确没有听过朱先生的课；二、我也做过一点西方文艺批评史的研究与翻译，而朱先生就是西方批评史、西方美学史的权威；三、朱虹的确是朱先生的受业弟子，在北大上过朱先生的翻译课，曾被朱先生称为他的“三个得意学生”之一，此事在学界广为人知，因为朱虹与我是一家人，难免有人会把我这一粒鱼目误认为是“珠子”了。

虽然我与光潜先生相隔不近，接触不多，交往甚少，但是，在学界长辈中，他却是我从年青时代一直到上了岁数，仰望得较多、关注得较多、思索得较多、揣摩得较多的一个，因此，在外界因素的作用下，很容易就引发出不少记忆与思念，何况有的事情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足以使我终生难忘。

二

在前辈师长中，我最早知其名者，要算是朱光潜。那还是在中学时期，从初中起我就开始喜欢跑书店，在书店里就曾不止一次见过开明书店出版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我也曾翻阅这本书，当时觉得书中所谈的好像都是比较深、比较严肃、比较“正经”的内容。什么美呀，艺术呀，审美呀，等等，离我那尚未开窍的脑袋比较远。那时，我感到亲切、有吸引力的，还只是还珠楼主、《鹰爪王》，与侠盗亚森·罗宾之类的书。即使后来到了高中快要毕业，已经准备投考西语系的时候，我仍然对朱光潜那高深的美学未敢问津。真正对朱光潜这个名字肃然起敬，那是在进了北大西语系以后的事了。

在20世纪50年代的北京大学，每年新生入学时，各系都要举行大规模的迎新活动，在西语系，活动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毕业班的老大哥带领这年的新生在校内整个燕园里走一遭，三三两两，边走边介绍，特别深入细致。在那次活动中，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就是从他们那里知道了北大西语系的教授阵容很强，有一大批著名的学者：赵萝蕤、吴兴华、张谷若、闻家驊、陈占元、郭麟阁、吴达元、田德望，等等，等等。而名人中之名人，则是两位超出于这些正教授之上的两个“一级教授”：冯至与朱光潜。对于这一大批名

师，西语系的学子无不津津乐道，并都引以为骄傲。

显而易见，冯、朱二位当时之所以是超越众大家的“一级教授”，是因为他们的文化业绩更大，学术声望更高。冯至不仅是公认的德国文学权威，而且是鲁迅赞赏过的“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杜甫研究也是蜚声学术界。朱光潜则早已是资深的美学研究的大师，早年几部力作并没有因为时代历史的变迁而褪色，也没有因意识形态的原因而丧失其学术价值，而且，早在抗战期间，他就担任过大学里的文学院院长，蒋介石为了表示自己礼贤下士、尊重文化，还曾接见过他，蒋介石撤离大陆前，他也是国民党派专机要抢运到台湾去的名教授之一，但他拒绝登机离去……

学子的崇拜从来都是名师崇拜，大部头论著崇拜。从一开始，朱光潜就足以使我辈肃然起敬，甚至有点顶礼膜拜，虽然他在“政治上”入过国民党，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但“政治上”的事我们不管，也不感兴趣，何况他不是最后拒绝站到台湾那边去吗？所有这一切，使我从没有对他有什么保留。

仅仅是以学术标准进行衡量，而不掺杂其他标准或其他因素，这与现今比较起来，倒可说是单纯朴实一些。现今者，时代进步了，实际操作的标准显然复杂细腻多了，其中有了官本位制的成分，有了商品社会中大为时兴的公关学的成分，以至在赫赫有名的“翰林院”里，没有多少学术业绩，没有什么社会声望，却头戴“特级研究员”、“博导”、“一级教授”的冠冕堂皇者颇有人在。

在北大的几年中，西语系这两个“一级教授”，做系主任的冯至，我们倒常见到，另一位朱光潜，则很难很难见到的。全系师生会，一年难得有次把，即使有他也不大出席。听说，他前两年教英文专业高年级的翻译课，高年级毕了业，他就没有课了，西语系教学中心的那幢楼也就几乎见不到他的踪影。只是有那么一次，一个小老头从附近穿过，有同学才告诉我：“那就是朱光潜。”

他大名鼎鼎，但毫不起眼，身材矮小，穿一身深蓝色咔叽布中山装，踏一双布鞋，像图书馆的一个老员工，甚至有点像一个杂役工。他满头银发，高悬在上，露出一个大而铄的额头，几乎占了半个脑袋。他步履稳当，但全身却透出凝重肃穆之气。